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

则近矣。明于天子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

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

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

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The Way of Chin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ism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

郭沂◎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3031869

B222.05
83

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
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
明，明而后能治。治而后能平。
则近矣！夫之以明明德于天下者，
其知在格物而知至，其行在齐家而
其德在修身而身修，其政在治国而
其道在平天下。故先齐其家，欲
致知在格物而知至，知至而后
能明，明而后能治。治而后能平。
君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郭沂◎著



B222.05
83



北航

C163928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郭沂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 - 7 - 5161 - 1630 - 2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儒家—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22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122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郭晓鸿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25

插 页 2

字 数 241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安乐哲

我认识郭沂博士并阅读他的著作已经十多年了。正是出于对他的著作的崇高敬意，我在这里满怀真挚的热忱向读者推荐他的新书。

郭博士是一位世界级学者。他曾在孔子家乡的曲阜师范大学受到十年的儒学熏陶，又赴复旦大学接受中西哲学的全面训练。自从1993年博士毕业后，他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职。在这个职位上，他成长为新出土文献分析与诠释领域中卓越的和有影响力的学者，经常被当作中国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受到邀请，来介绍当今中国学术界的最新动态。以这样的身份，他曾经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达慕思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首尔大学、科隆大学、慕尼黑大学、科克大学、威尼斯大学、苏黎世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作过主题演讲。2012年，他又被聘为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

新近出土的考古文献要求我们回到过去并重新解释中国哲学奠基阶段的历史。在这方面，郭博士是一位领军人物，其他学者在从事自己的诠释的时候，往往是以郭博士对这个文献宝藏进行重新整理和详尽考察所形成的开创性研究为基础的。由于我在自己有关新近出土文献的好几种著作中和课堂上曾经频繁地引用郭博士关于郭店考古发现尤其是《老子》和《五行篇》的成果，所以我愿借这个机会表达我个人对郭博士的感谢之情。

郭博士的一个鲜明风格是，能够很快地为他的理念发现下一个新的领域。因此，从历史研究转向现实关怀，从《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到《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也就顺理成章了。

郭博士是一位真正的学者，更是一个公众知识分子。数千年来，中国学术形成了这样一个传统，即知识分子要承担起勘探社会和政治地形，并为规划未来中国提供自己视角的责任。近年来，郭博士遵循这一传统，一

一直在以学术为平台，来展望儒学对未来中国的影响。显而易见，在当前的历史关头，中国正在进行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这种摧枯拉朽的力量需要对未来的中国从成长的传统文化土壤进行深刻反省的引导。从这个方面看，郭博士是一个文化园丁，不仅在修剪历史的花园，而且在为中国耕耘未来的绿洲，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就充分体现了其士人情怀。

该书第一篇《中国之路》从中国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分期、中国的天下一体化以及中国的文字、思维、文化、哲学、宗教等众多方面对中国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历史考察。第二篇《时代抉择》将目光转移到现代化、全球化、第二个轴心期、民主浪潮等当今世界性问题，并据此描绘出未来中国与人类的发展方向。在作者看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民族意识形态，而重建作为传统民族意识形态的儒学，是其中的核心工作，所以《儒学重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三篇的题目。作者并不完全认同学术界有关儒学史分期的种种意见，认为尽管儒学经历了原始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现代新儒学五种学术形式，但其思想范式只有两个，即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当代儒学的使命是建构第三个儒学范式，即当代儒学范式。他提出，儒学范式由三大支柱构成，道统论是儒学范式的宗旨，核心经典系统是儒学范式的依据，而哲学体系是儒学范式实际载体。在第四篇《哲学创构》中，作者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尤其儒道两家有关道的学说，纳入西方哲学的视角，扣紧当今世界的问题意识，创造性地提出了道哲学理念，为其进一步的哲学探索奠定了基础。

郭博士从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出发，即作为一种传统，儒学是容纳百川的，来自外部的资源使它不断地得到重塑。第一波西方学术是佛学。从2世纪佛学就开始导致儒学的转型，并且成为宋明理学形成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力量。16世纪晚期，先是耶稣会士，然后是新教传教士，开启了第二波西方学术。在上两个世纪中，他们对儒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正是20世纪的第三波西方学术，向现代新儒学提供了需要更彻底理解的关于发展和批评的资源。

郭博士又是一位展望中国文化在新时代将对世界价值发生影响的有远见的学者。他分别从《周易》、道家、儒家、佛教四个最能反映中国人价值观的思想文化体系中提炼出太和、自然、仁义、慈悲四个范畴作为中华普世价值，以弥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的缺

陷，这对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我们不能过高地估价财富的重要性。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固然首先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已经浮现出来；但最近通过软外交，中国又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呈现出来；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中国将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会很快地积累影响。奥林匹克运动会曾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平台，数百所合办的孔子学院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对中国语言的兴趣正在全球迅猛提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对儒学作为一种仍然活着的传统进行细致入微的理解。在正处于变化之中的世界秩序里，郭博士不管在学识上，还是在创造力上，都有资格成为这一新方向的发言人。

因此，我郑重向读者推荐郭沂博士和他的新书。

安乐哲

2013年1月2日于夏威夷大学哲学系

目 录

序 安乐哲(1)

第一篇 中国之路

第一章 中国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分期	(3)
一 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历史分期	(4)
二 社会关系形态及其历史分期	(5)
三 社会政治形态及其历史分期	(6)
四 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历史分期	(8)
五 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形态与历史分期	(11)

第二章 中国的天下一体化	(15)
一 古代中国的天下一体化	(17)
二 儒家天下主义概要	(20)
三 天下一体化对全球化的启示	(24)

第三章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文化风格	(27)
一 文字、思维、文化	(27)
二 哲学与宗教	(32)
三 形上学	(33)

第二篇 时代抉择

第一章 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趋势看中国现代化之路	(39)
一 现代化、现代性与传统性.....	(39)

二	全球化过程中的现代化趋势	(44)
三	略析对中国现代化的种种误解	(50)
四	中国现代化之路	(62)
五	余论	(69)
第二章	第二个轴心期与中国人的信仰系统	(71)
一	第二个轴心期的实质	(71)
二	中国人的信仰系统	(75)
三	中华信仰与第二个轴心期的精神方向	(79)
第三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普世价值	(81)
一	太和	(82)
二	自然	(83)
三	仁义	(85)
四	慈悲	(89)
五	中华价值的普世意义	(90)
第四章	民主浪潮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意识形态	(92)
一	现代社会基本价值取向二元化的世界潮流	(92)
二	中国的民族意识形态及其历史变迁	(96)
三	儒学何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的民族意识形态	(99)
四	当代中国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趋势	(101)
第三篇 儒学重建		
第一章	儒学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	(107)
一	作为儒家核心价值的道	(107)
二	道的形成与扩充	(111)
三	道的论证	(116)
第二章	转换范式——儒学当代发展的使命	(121)
一	当代学者对儒学现代转型的探索	(121)

二	当代儒学范式及其使命	(123)
第三章	天人统与人天统——当代儒学范式的道统论	(127)
一	道统说源流	(127)
二	天人统、人天统及其历史轨迹	(130)
三	两统并承开新篇	(135)
第四章	五经七典——当代儒学范式的核心经典系统	(137)
一	从六经到四书五经	(137)
二	五经七典及其道统、文献依据	(139)

第四篇 哲学创构

第一章	道哲学的提出	(149)
一	当代哲学的任务	(149)
二	重建形而上学的中国路径	(151)
第二章	宇宙大爆炸与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论	(153)
一	宇宙大爆炸理论	(153)
二	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论	(154)
三	原始元点与万物之间的内在关联	(160)
第三章	道体——万物从何而来	(162)
一	道的构成	(162)
二	道的特征	(165)
三	“无极而太极”	(166)
四	太极生万物	(167)
第四章	性体——我们是谁	(171)
一	人、物之性的差别	(171)
二	人性的差别	(176)
三	从主观心、客观心之别看“性即理”还是“心即理”	(179)

第五章 心体——我们能够做什么	(182)
一 知——认知、感知和觉知	(182)
二 情——情爱本能、生理欲望和情绪	(184)
三 意	(186)
四 认知心与生命心	(187)
五 万物的目的和意义	(188)
六 价值生命的层次和人生境界	(191)
七 生物生命和知识对价值生命的腐蚀	(193)
八 价值生命和生物生命的互相渗透	(195)
九 从孟荀的以情为性说看善恶的起源	(196)
第六章 人道——我们应当怎么做	(200)
一 文化及其系统	(200)
二 终极价值与一般价值	(201)
三 作为终极价值的“道”及其形成	(203)
四 文明的重估	(205)
五 体用图	(207)
附录 回应道哲学——中西哲学对话的一个案例	(209)
一 道哲学与斯多葛学派之比较	(209)
二 道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联	(211)
三 西方哲学中的知识与价值	(213)
四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215)
五 中西哲学对话的意义、问题与世界哲学的趋向	(215)

第一篇

中国之路

第一章

中国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分期^①

社会形态及其演变不但是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切实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与未来社会的走向，具有重大意义。关于中国的社会形态及其演变，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马克思根据西方历史提出并由斯大林总结的五种生产方式论。但是，这种学说是否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却一直受到怀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都曾有热烈讨论。目前，这个问题重新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我以为，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明确判定社会形态的标准与根据。

顾名思义，五种生产方式论主要是按照生产方式来判定社会形态的。最近，刘泽华先生提出了分层次地把握社会形态的新设想。他认为有三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是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它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而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基本面貌。其二是社会控制与运行机制形态问题。马克思说过，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对认识中国传统社会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其三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范式问题，王权主义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刘先生按照这三个层次论述了中国社会形态的特点，但没有把这个问题和历史分期联系起来。^②

尽管我不能完全赞成刘先生的具体论述，但认为他这种分层研究社

① 本章内容曾刊于《文史哲》2003年第6期。

② 刘泽华：《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会形态的方法可谓有识。我进而认为，不但可以从不同层面把握社会形态，而且还可以把社会形态本身分为若干层面。社会形态的每个层面不但有各自的特点，而且有各自的发展规律，我们甚至可以据此分层次地进行历史分期。

我仍然沿用传统的概念，把社会形态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四个自下而上的层面，并以之探讨中国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

鉴于原始社会或史前时代为世界各民族所共同经历，这个时期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形态大同小异，而学术界对中国原始时期的社会形态争议也不大，所以此处从略。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各民族的文化逐渐异彩纷呈、个性突显，而有关学术争议也层出不穷，故本章着重讨论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形态。

一 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历史分期

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形态大致都属于生产方式的范畴，过去学术界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已经相当深入细致，所以下面首先简略地阐述一下笔者在这方面的看法。

中国经济形态及其演变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和相应的三个阶段，即农业社会、农商社会和工商社会。

春秋以前，尽管也存在手工业、商业、渔牧业等等，但当时社会经济的主流为农业，是为农业社会。

自战国到洋务运动以前的中国经济，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门，即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其中，农业和手工业是产业经济，商业是交换经济或市场经济。在产业经济中，又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为辅。过去，人们对这个时期商业的发达程度认识是不够的。最近何兹全教授指出：“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大变化，是由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经济向商业交换经济、城市经济转化。由战国开始，交换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一直维持到东汉，有六七百年。”“可以大略地说，汉代城市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40%左右。”^① 宁可教授则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另一次大发展是在唐宋以后：“唐宋以后，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市场、货币、城市等等与以

^①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三个关键性时代》，《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前不同的发展，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如茶、棉的商品化、区域性市场的扩大及市场网络的逐步形成，日用品如粮食的长途贩运，纯经济性市镇的兴发，贵金属白银的使用，土地买卖的兴盛，土地的转佃，出现了定额租、货币代租乃至货币地租，封建国家田赋征取从实物劳役逐渐向货币转化，封建国家对经济、商品和市场的管理、控制也逐步松弛，等等，都显示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① 可见，商品经济已经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所以，我把从战国到洋务运动以前这个阶段整体地称为农商社会。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大工业生产，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形态开始发生又一次转变。西方学者将现代西方社会称为工业社会。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可避免地将中国纳入这一经济体系之下。工业社会的重要特点，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加强和农业经济的削弱。因此，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将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经济形态笼统地称为工商社会。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工商社会经历了异常曲折和痛苦的过程。洋务运动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艰难地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1949年以后，整个世界处于冷战状态，中国重新实行闭关锁国，这严重干扰了工商社会的正常发展。至十年“文革”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197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巨大经济成就。放在大的历史脉络上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运动，是重建工商社会，或者说是将工商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纳入健康道路上的过程。

二 社会关系形态及其历史分期

中国社会关系形态也可分为三种形态和相应的三个阶段，即贵族社会、士人社会和公民社会。

金景芳先生曾把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归为奴隶社会，并把当时社会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一个是君子，即自天子至士的阶层，属统治阶级。另一个是小人或野人。士之下为庶人工商皂隶牧圉，也可称为小人，

^① 宁可：《中国社会形态研究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他们和野人都从事体力劳动，属被统治阶级。^① 钱穆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两个对立的阶级，一是贵族阶级，二是平民阶级。^② 当然，贵族居支配地位，属统治阶级。鉴于此，我把战国以前称为贵族社会。

按照钱穆先生的看法，秦汉以后的中国，不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是一个流品社会，是一个分为士农工商四流品的社会。其中，士是一个参加政府的特殊流品。也就是说，秦汉以后的政府，由士人组成；秦汉以后的政府，变成了士人政府；秦汉以后的社会，由士人来领导和控制。^③ 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从秦汉至明清这个阶段，称为士人社会。

辛亥革命以后，受西方社会形态的影响和中国自身的原因，中国开始步入公民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指具有一定的国籍，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基本义务的人。在公民社会，尽管人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也存在着一定差别，但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具有同等的地位，这是以往的贵族社会和士人社会所无可比拟的。公民社会和现代国家、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的。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复杂的原因，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也命途多舛。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地发展，市场经济日趋成熟，进一步建设公民社会，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

三 社会政治形态及其历史分期

中国社会政治形态及其演变要复杂一些，大致经历了五种形态即五个阶段，它们是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④

圣权时代指五帝时期。关于五帝，史学界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二是属原始社会末期。我以为这两个判断都需要重新考量。

其实，古书中有大量有关五帝的记载，而《史记》开卷便是《五帝

^① 金景芳：《论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② 钱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见《中国历史精神》，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卷，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

^③ 同上。

^④ 这里的几个“权”字颇费踌躇，我曾考虑使用“道”字或“政”字，皆感不确，最后还是用了“权”字，以体现马克思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论断。

本纪》。由于时代久远，这些记载难免有失真之处，但不可因而判定五帝为传说中的人物，甚至怀疑和否定他们的存在。

据报道，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也就是尧都平阳故地的发现表明，大约距今4200—4500年左右，即尧舜时期，中国古代国家可能已经形成。首先，从墓葬规格和随葬品看，当时已有阶级的划分。其次，发掘出写有文字的陶器和用红铜制造的铜铃等物件。而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可能为城墙的夯土建筑，极可能就是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也就是说，古代国家形成的主要标志即城址、阶级、金属及文字都已具备。^①如果这项考古发现得到进一步证实，那么它不但有助于消除尧舜的“传说”色彩，而且也表明当时的中国已经走出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

先秦各家各派几乎都把五帝称作圣人。在他们看来，五帝既是帝王，又是圣人，当时的政治是一种圣人政治。这是我提出圣权时代之说的主要根据。

那么，这种圣人政治具有什么特点呢？不妨引用郭店简《唐虞之道》的阐述：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不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贪，没而弗利，穷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放，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无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

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孝而化乎道。不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②

这些论述虽有一些理想色彩，但也一定有其基本的事实依据。据此，我以为圣权时代政治的主要特点是“爱亲”、“尊贤”、“尚德”（“上”宜读作“尚”）、禅让，而其中最根本的是政权交替方式禅让。尽管许多先秦古籍载有尧舜禅让的事迹，但自古一直有人否定这种说法，甚至断定它

^① 据2000年6月15日香港《文汇报》报道。

^② 据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